导　论

悠久历史与神话传说

神话传说是先民遗留的精神文化财富，是先民对自然的理解、对人类产生和民族历史的解释。

山西古代神话传说，在整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，这个重要地位是由山西悠久的历史、山西神话传说的性质所决定的。

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。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南部，又是这发祥地的首要代表地区。考古发掘证明，在山西南部，文明起源最早，在芮城县西侯度，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明遗址，时间距今 180 万年。西侯度人已能够用火，能够打制石器。考古学家贾兰坡、王建认为以西侯度人为代表的古人类，是中国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人类。芮城匼（kē）河遗址，距今约 70万年，介于西侯度文化与丁村文化之间，反映这一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。襄汾丁村文化，距今十余万年，是旧石器中后期的文化，反映了早期智人文化特征。山西各地旧石器时代遗址约 300 多处。

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遗址和陶器等，也是全省均有分布而晋南最多。翼城县枣园农耕生产遗址、翼城县北橄制作彩陶遗址，反映新石器时代晋南人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文明史的推动性贡献。北橄彩陶的特征是刻有玫瑰花形图案。考古学界因其鲜明特征而称当时的晋南先民为玫瑰部落。

玫瑰部落强势扩展，范围所及，东至黄河下游，西至河套与祁连山区，南达长江流域，北至大漠。玫瑰花图案为这种文明的代表，中华之“华”，由此而来（华与花古代相通）。

玫瑰行动持续千年。到其后期，渭水流域黄河南岸的原有部落，学习玫瑰部落先进文化后重新崛起。历史进入部落联盟对峙、炎黄争霸时代。这是需要英雄并产生英雄的时代，是战乱频仍、风云激荡、悲喜交替、令人惊叹的时代，也是神话传说大量产生的时代。在炎黄神话传说之前，最重要的是女娲神话。女娲神话反映人类的诞生，以及先民同自然的斗争。女娲造人是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。屈原《天问》、王逸《楚辞注》、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解析，都印证了女娲的身份地位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中，有一气势磅礴的女娲故事，反映先民战胜猛禽猛兽、森林大火与滔滔洪水：

> 往古之时，四极废、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；火爁炎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；猛兽食颛民，鸷鸟攫老弱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苍天补，四极正。淫水涸，冀州平。狡虫死，颛民生。背方州，抱圆天。

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洪水神话、创世神话相比，女娲神话气势更大。女娲顶天立地，能力惊人。故事中一再明确地点是冀州。古冀州即今河北、山西南部地区，正是晋文化区。这里是华夏先民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。女娲之墓，在山西有两处：其一在芮城风陵渡，与最早的旧石器文明遗址西侯度相距不远；其二在尧帝建都的平阳盆地北端的赵城。在平阳盆地东部的浮山，有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处，有女娲庙。女娲神话中，面对毁灭性巨大灾难，女娲表现出的不畏艰险的英勇气概令人敬佩，她战天斗地的对策和雍容气度令人景仰。

父系氏族时代最重要的两个部落联盟领袖是炎、黄二帝。他们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。古史记载和神话传说中，炎、黄二帝的活动与山西密切相关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对炎、黄二帝的记载，时间早且有史乘特点：

> 昔少典娶于有蛮氏，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，成而异德，故黄帝为姬，炎帝为姜，二帝用师以相济（挤）也。

两个部落曾经在同一联盟中，情如兄弟。后来两个部落分别得到很大发展。炎帝部落稼穑五谷，农耕成就很大，故炎帝称神农氏。炎帝部落在黄河中游建立了部落联盟，而核心地区在今山西南部。据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直到商周时期，今山西地区仍有炎帝后裔建立的黄、姒、蓐、沈等方国。此外还有焦、瑕等方国也是炎帝后裔所建。根据《帝王世纪》，周代建都蒲坂的烈山氏也是炎帝之后。这些都印证炎帝部族在今山西分布之广。

奇异的精卫复仇故事，也产生在这一地区。《山海经·北次三经》载：

> 发鸠之山，其上多柘木。有鸟焉，其状如乌，文首白喙赤足，名曰精卫，其鸣自詨。是炎帝之少女，名曰女娃。女娃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，故为精卫。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堙于东海。

这故事反映出坚忍不拔的抗争勇气，复仇意志令人震撼。精卫身躯之微小反衬出她精神意志之伟大。故事的奇诡与悲剧气韵交织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激励后人。发鸠之山，在今山西长子县，位于太行山南部，与此山相距不远，有炎帝陵，位于今山西高平县。高平关于炎帝的传说不少。炎帝陵且有墓碑，可见影响一直较大。炎帝陵不独高平一处。如果这个部族前后领袖均可称炎帝，那么联系南方的炎帝陵来看，正可见这个部族由北而南的迁移之迹。迁移的原因，是被黄帝族打败。

黄帝族制造交通工具的成就，可谓古代的科技贡献。他们制造车辆，极大地提高了运输、迁移和作战的能力。黄帝因制造使用车辆而称轩辕氏。他的部族自渭水流域东下，与炎帝族激烈争战。汉初贾谊《新书》卷二云：“炎帝者，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，各有天下之半。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，故战于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。”《吕氏春秋·荡兵》也记载了这次战争。炎帝战败南迁，黄帝成为中原共主。其后南方部族的首领蚩尤北上争战。罗泌《路史·后纪四》说：“蚩尤姜姓，炎帝之裔也。”蚩尤善战，黄帝则调动部落联盟各方面力量，经过激战，杀死蚩尤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载：“蚩尤作兵伐黄帝，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云：“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擒杀蚩尤。”

两次重要战争都发生在涿鹿。今河北北部有涿鹿县，有人遂把此地解释为炎黄古战场。但炎黄二帝都活动于黄河流域，这里是文明中心。所以炎帝南迁后还想打回来。当初黄帝从西方打来，炎帝为何放弃黄河中流根据地，

跑到河北北部摆战场，殊不可解。关于涿鹿的另一种说法是：今山西解州。罗泌《路史》曾辨析此事，主张解州即涿鹿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三说：“解州盐泽……卤色正赤……俚俗谓之蚩尤血。”当地称晒盐池水为卤，卤水化学成分特殊，日照呈红色。因为蚩尤死在池畔，血流池中，当地才以此解释池水发红的原因。若非事出有因，俚俗岂能把池水发红与南方蚩尤扯到一起。元末王翰《盐池晓望》诗云：“涿鹿城头分曙色，素池如练迥无尘。”直接以解州称涿鹿。或者把池畔坞堡，俗称蚩尤城者称为涿鹿城，于理也通。王翰官至翰林编修，学问颇佳，他隐居这一带多年，熟知民俗传说，且不以为谬，才会用在诗中。

晋南盐池为何风云际会，兵家必争？在古代这里必定是华夏先民最主要的食盐来源地。当时东方海滨还是蛮荒之地，海水制盐工艺当时人也难以掌握。惟有晋南盐池，能够天然结晶可以捞取。占据盐池宝地，本部族可以吃盐，甚至还能挟制号令其他部族，因而盐池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晋南地区，地势险要，物产富饶，位置居中，不但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，也是黄河文明核心地区、上古时代经济政治中心。炎黄之争以后，经历各种文化融会发展，华夏历史进入辉煌的尧舜禹时期。相关的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更为丰富多彩。根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和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尸子》、《邓析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帝王世纪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晋书·刘元海载记》、《拾遗记》等等各类古籍，可知尧舜禹统治中心就在晋南。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禹都安邑。文献之外，还有遗迹、传说、地名等等佐证。

史学界高度重视晋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。著名学者苏秉琦称之为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，强调要把握住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。

把握好这个“直根”，我们整理古代神话传说时，就有方向脉络可寻。面对零散的、相互矛盾的各种记载和传说，就有了辨别、判断，甚至取舍标准。把握住“直根”，梳理好基本脉络之后，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神话传说，合理编排丰富多彩、神奇怪诞的情节和细节。比如说，黄帝、蚩尤之战，很多古籍都有记载。仅《山海经》中，蚩尤阵营有风伯雨师，黄帝则请下天女克制风伯雨师，应龙是黄帝阵营的作战主力，他与夸父为敌。这样，夸父虽然没有参与黄帝蚩尤之战，但如果要编中国古代“神谱”，夸父似乎与蚩尤一派。其他古籍对双方人物的记载，也可以组织进来。比如蚩尤铜头铁骨，能吞沙石充饥。蚩尤兄弟九人。黄帝部下的夔以海兽皮作战鼓，

能够声闻五百里等等。若编排组织起来，中国的“神谱”也能气势恢弘。这个“神谱”不能由后人创造，只能根据散乱的古代材料编排组织。编排组织当中，晋南的“直根”作用就更显重要。

这一阶段神话传说的“直根”，就是女娲一炎黄一尧舜禹神话传说。

随着社会发展，认识水平提高，生活经验不断积累，人们可能意识到以往的解释未必正确，他们对英雄神话的传颂热情逐渐降低，英雄神话阶段随之结束。随着关注对象与解释方式的变化，中国的神话传说逐渐进入第二个阶段，即志怪阶段。

从英雄创世神话转为现世的普通的鬼神志怪，这在社会思想史上是一种进步，在文学史上是一次质的变化。这次变化发端于战国时期，地域则在山西，代表性著作是《琐语》。西晋太康二年（281），在原属战国魏国的汲郡地方，有古墓被盗，魏襄王墓中，出土一批古籍。事发后西晋朝廷很重视，派文臣束晳整理这些古籍。束晳分类整理，其中一批古籍性质是短小的占卜说梦神怪故事,束晳定名为《琐语》,后代也称之为《汲冢琐语》。《琐语》至宋代失传，部分文字散见其他古籍中，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有如下评述：

> 晋平公梦朱熊窥其屏，恶之而疾。问于子产，对曰：“昔共工之卿曰浮游，败于颛顼，自沉于淮。其色赤，其言善笑，其行善顾，其状如熊，为天王祟。见之堂，则王天下者死；见之堂下，则邦人骇；见之门，则近臣忧；见之庭，则无伤。今窥君之屏，病而无伤，其祭颛顼、共工乎？从其言而病间。”右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汲冢琐语》之文。《束晳传》所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者，推此可见。盖古今纪异之祖。

胡应麟先转引原文，再做评论。古今纪异之祖，就是志怪小说创始之作。这评论很大胆，《汲冢琐语》及《山海经》等，可将中国志怪小说的历史上推到战国甚至春秋后期。魏国曾是战国强国，定都安邑时期，西取秦国河西地，北灭中山国，南败楚国，成为晋的代表。而《太平御览》所引的《琐语》中故事，又是三家分晋之前的故事，不独魏国所有。可以认为《琐语》是晋文化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。由英雄神话向世俗志怪的转移，未发生在楚国、秦国、燕国和齐鲁，而首先发生在三晋，这是由三晋文化的进步性、平民性、世俗性所决定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民族融合与文学融合

中国文学，从形式上看，主要是汉语文学；从本质上看，则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作的文学。山西文学，最能反映中国文学的这种本质。

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作中华文学，这大概是无人反对的宏观主张。但实际上，各省份、各地区的情况，不大相同。就山西地区而言，社会生活的基础就是民族融合，文学创作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，充满了直接间接的反映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独特价值。

山西地理，南北狭长。南部是黄河文明发祥地，是中原农耕文明地区。北部是北方文明边缘地带，是草原游牧文明边缘地带。山西的东部是恒山、太行山，西部是吕梁山与黄河。两山之间的汾河谷地与其他盆地，土地平坦肥沃，水源比较充足，适于人类生息。山西南部，文明发达较早，山西北部，也并不落后。早在旧石器时代，山西北部就有许家窑人。稍后的峙峪人，以骠悍善射著称。在朔州峙峪出土的箭镞，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箭镞，颇为锋利。这令人想像那些狩猎先民的勇猛和才智。两种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，或者北上，或者南下，碰撞交融，就发生在两山之间的谷地中。

特别应当提出的是，两种文明的力量，都有源源不断的后续补充。晋北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的天然通道。在这以西南下，有黄河及毛乌素沙漠阻隔；在这以东，有燕山山脉阻隔。大同盆地一片沃野，北接大草原。游牧民族易于在此停留和南下。比如匈奴民族主要由此南下。而生活在其他地区的民族，经常先作东西方向的迁徙，然后再由此南下，鲜卑族就是这样定都平城（今大同）建立北魏。一些文化史学者提出古代东北亚十字通道的观点。冯天瑜曾提出，古代塞人、月氏、义渠、林胡、楼烦、匈奴、东胡、鲜卑等游牧民族共同维系一条纵贯东西的大通路。通路西端，由塞人打通中亚和南俄罗斯草原，在黑海地区与希腊人相遇。在这条通路上，游牧民族跋涉万里不以为远。他们也有南北大通路，由西伯利亚、北海（贝加尔湖）、漠北直到漠南。两条大通路的交汇处，就在大同以北的草原上。由这个路口南下，就是大同盆地。自然地理决定了晋北成为一个个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。英国学者麦金德在其著名的《历史的地理枢纽》一书中，提出世界的地理枢纽一说。谁占据地理枢纽，谁就能向外出击，控制一个大的区域甚至成为洲际霸主。麦金德指出亚洲地理枢纽正在蒙古草原。这或许也能解释游牧民族不

断南下的原因。

晋南地区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它抗击着北方草原文明的冲击，同时又向北推进，扩展自己。两种文明碰撞交汇直到融合，构成山西文化史的第一旋律。

夏商时代的民族融合已无法详考。直到西周，晋南地区仍是华夏族和戎狄族杂处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，唐叔虞初封，方圆百里而已。周围是其他方国与戎狄。直到春秋，“戎狄之民实环之”（《国语·晋语》）。晋国通过大量分化瓦解工作和连续几个战役，才灭掉以潞氏为首的赤狄，控制晋东南地区。与白狄在晋中地区进行的战争，规模更大，更激烈。晋军学习敌人的长处，放弃车战，改用步兵，取得胜利。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“以夷制夷”的战法改革，也可见山西素有“师夷长技”的传统。

晋国同戎狄民族既有战争，更有交往融合。著名的魏绛和戎，不但成效好，而且魏绛总结了与这些民族和平交往的观念及办法。晋献公在戎狄民族娶了几个妃姬。他的儿子、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就是戎姬所生。重耳避祸出逃，居住狄国 12 年，并娶了狄女。他的随行者赵衰也娶狄女，生了赵盾。晋国公族女子也嫁戎狄。晋景公的姐姐就嫁赤狄潞氏国君。戎狄之人在晋国做官也很普遍，心理并无隔阂。晋国同戎狄争战，是为了壮大自己，这与晋国灭掉若干与周天子同姓的姬姓小国并无二致。晋人对戎狄不抱种族偏见，交往多且乐于学习对方长处。

战国时期，赵国面临北部游牧三胡——林胡、楼烦、东胡的巨大压力。赵武灵王学习对方长处，胡服骑射，取得一时胜利。三胡后面，更强大的匈奴正在崛起。秦汉之际，“单于之庭直代，云中”（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），这一带成了匈奴的核心地区。秦始皇筑万里长城；汉高祖被困白登山七日七夜；汉武帝北击匈奴，长驱直进，都是双方的激烈碰撞。李陵降敌，在北国草原哀叹悲歌；匈奴贵族降汉，被封侯安置。在襄垣的襄城侯，在猗氏的下麾侯，遥望北国，心中可有感叹？这都是碰撞时期的复杂心声。

东汉时匈奴分裂，南匈奴内附，被安置塞内。到曹操时又调整安置地区，南匈奴主要居于山西，晋北、晋中、吕梁都有大量匈奴人。到西晋末，这批匈奴人建立汉国，导致西晋灭亡。这是北方民族在塞南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权，其中又颇有值得思索之处。这个政权以“汉”为国号，其单于早已改姓为“刘”，自称汉朝外甥。汉国主刘渊的汉化程度很高。他在少年时就拜著名学者崔游为师，学习典籍，而“尤好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孙子兵法》，略皆诵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、诸子，无不综览”（《晋书·刘元海载记》）

这种民族政权的颠覆更迭过程，更多染上政治斗争、政权争夺色彩，而民族斗争的色彩并不太浓重。或者说，民族斗争被限定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。当然，由于各民族历史道路不同，有的民族入塞建立政权之前，汉化程度不高，但建立政权之后，却迅速汉化，如鲜卑族就是这样。我们看北魏皇帝与大臣联句作诗，会由衷产生这种感叹。

强大的匈奴民族在内迁过程中，出现过不少使人动容的显赫人物、显赫事迹。如匈奴别部上党羯人石勒建立后赵，几乎统一整个北方。如率领部众定居平阳（临汾）的南匈奴于扶罗单于。如北魏政权初期，几乎灭掉北魏的匈奴别部铁弗人。如依附前燕政权，封云中郡公定居广灵的匈奴贺赖头单于。如后秦政权下起义占据平阳的匈奴大单于曹弘。如北魏最强盛时，占据吕梁山区上党山区对抗朝廷的山胡与并州胡。如直到隋末还自称突利可汗的离石山胡刘季真……— 方面，历史长河滚滚向前，一个又一个更晚的政权都已经更替了；另一方面，来自草原的血统来自大漠的性格，已融化在一批批平阳人上党人离石人中间，形式上找不到痕迹了。只有文化史和文学史，因为本身的最高使命就是人学和心灵史，必须关注这些血统和性格，正是它们使文学的歌吟各自不同。

融合在山西的民族实在太多了。

西晋末，乌桓杂夷三万户南下晋阳，依附刘琨。

前秦灭亡时，苻丕率六万氐人转入山西。

在平城建立北魏的鲜卑人统一了整个北方。北魏曾迁大批高丽人和东方杂夷充实平城。

北魏灭北京，迁北凉民三万家充平城。这批甘肃人的民族成分很复杂。

北魏获高车族部众十余万人，安置平城北，修筑鹿苑。

契胡依附北魏定居晋北，根基牢固，势力极大。区域跨保德、五寨、神池、宁武数县的朱家川，竟依契胡酋长尔朱氏得名。

敕勒族北魏时由阴山南迁，逐渐入塞，只有怀旧的《敕勒歌》流传。

隋朝突厥族启民可汗内附，居于朔州大利城，突厥部众源源而来。隋末唐初处罗可汗、颉利可汗曾干预中原政权。窦建德、刘武周、王世充皆称臣。李渊也主动交好之，可见突厥势力之大。

唐朝，突厥九姓部落降附，就近安置，散居太原以北。居晋南者称降户，已不提民族。

吐谷浑民族中唐以后降附，入居雁北，逐渐南迁。五代时，吐谷浑名将白承福的部众被安置太原东山。李万江、白承福、白铁贾、赫连公德等首领

死后，这个民族的身影模糊了。

沙陀族也是中唐以后降附，随范希朝而入居雁北，但这个民族的辉煌却是在降附以后。他们唐末崛起，占据晋阳为根据地，五代中唐、晋、汉三个朝代都是这批沙陀人所建。

契丹人、库莫奚人、女真人、蒙古人、满族人、柔然人、薛延陀人、羌人、回纥人、党项人，还有族属不清的众多部族，如五代时的山前、山后、逸利、越利等部族，都曾在山西历史上留下深浅不同的痕迹，又都消融在山西的历史中。

民族融合过程中，在文化、艺术、文学领域，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：第一，这些不直接联系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，继承性很强，已经不再是草原游牧生活了，但还唱着草原上的歌曲，还痴迷那高亢悠扬的曲调。第二，文学艺术之类，感染力很强，不但本民族欣赏和继承，还很容易传播感动其他民族。民族融合了，审美趣味还在，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的审美风貌。第三，文学艺术的继承、传播、创作、欣赏、批评、改造当中，存在着精英和大众的区别。精英人数虽少，却能引导趋势。如果存在着独特的民族背景，那么精英更能引导有关大众。明了以上三点，有助于认识山西文学的独特民族背景及审美特征，有助于认识元好问等很多文人的特殊贡献。

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汉化过程中，皇族拓跋氏改姓为元。多少个朝代过去了，忻州地区的平民百姓，大概很难把当地的元氏家族同什么北魏皇族联系起来。然而在金末元初的动乱中，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写给元好问的诗中说：“魏帝儿孙气似龙，而今飘泊困尘中。”这诗中含有种族追忆，对元好问祖先的追忆和对元好问处境的感慨。耶律楚材是通晓古今的文人，而且他本人是辽朝契丹皇族的后裔。他心中深藏种族记忆，对辽朝兴亡、家族盛衰的感慨，对家族血统的自豪等等，这些，能激发他的奋斗，指导他的行为，左右他的审美选择，影响他的文学创作。所以他给元好问的诗中就蕴涵感慨。

元好问对家族血统，不像耶律楚材那样直言不讳，但元好问诗中，在尚武精神、审美理想方面，却表现了北方民族的气质和追求。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之七云：

慷慨歌谣绝不传，穹庐一曲本天然。
中州万古英雄气，也到阴山敕勒川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绝句高度评价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出自天然，慷慨豪壮，体现万古英雄之气。元好问的祖先、北魏孝文帝元宏、彭城王元勰，同几个汉族大臣联句作诗，正是这种气象：

白日光天兮无不曜，江左一隅独未照。（元宏）
愿从圣明兮登衡会，万国驰诚混内外。（元勰）
云雷大振兮天门辟，率土来宾一正历。（郑懿）
舜舞干戚兮天下归，文德远被莫不思。（郑道昭）
皇风一鼓兮九地匝，戴日依天清六合。（邢峦）
遵彼汝坟兮昔化贞，未若今日道风明。（元宏）

（《悬瓠方丈竹堂飨侍臣联句诗》）

诗中理直气壮地自居正统，要求统一天下、收伏南朝的气概很盛，但又强调王道，以德化人，不是一味尚武。鲜卑民族自进入山西定都平城以后，汉化速度、民族融合的胸襟和改革魄力，都令人惊叹。元勰在上党铜鞮山曾作过一首咏松树的小诗：“问松林，松林几经冬？山川何如昔？风云与古同？”这诗虽然简单，却流露出历史沧桑之感，融入汉地的山川风物和历史沧桑，透露出文化认同的心理特征。

元好问的朋友李汾的诗作清刚激越、悲壮豪放，咏沙陀族历史的篇什更为珍贵，从内容上、风格上都丰富了山西的诗歌。李汾是沙陀族人，沙陀首领李克用的后裔。沙陀族进入山西后，唐末崛起，由雁北入据晋阳，五代时连续建立唐、晋、汉三朝。宋初，朝廷毁掉晋阳，将此沙陀“龙兴”之地夷为平地，改地名为平晋县。李汾一族不肯迁走，故为平晋人。李汾生长此地，对民族命运感触良多。在金末风雨飘摇中，李汾有《感遇述史杂诗五十首》，其中写当年沙陀首领李克用一诗，名为《远祖雁门武皇》，诗曰：

死心唐室正诸侯，铁马南来隘九州。
当日三垂岗上意，诸孙空抱腐儒羞。

但李汾的感叹，又建立在特殊的种族记忆基础上，格外强烈沉郁。李汾

终于离开金朝国史院，毅然投笔从戎，丧生在金末动乱中。这同他的民族背景与思想性情相关。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激越悲凉不同凡响。如《雪中过虎牢》诗：

萧萧行李戛弓刀，踏雪行人过虎牢。
广武山川哀阮籍，黄河襟带控成皋。
身经戎马心愈壮，天入风霜气更豪。
横槊赋诗男子事，征西谁为谢诸曹。

此诗写景及刻画物象方面，不但不回避，反而有意突出了肃杀寥廓苍凉的气氛。突出了踏雪远征的人物，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风貌。在艰难忧患里，更显出英雄本色。寥寥数语，就表现出悲壮阳刚崇高之美。

元代著名山西诗人萨都剌字天锡，出身西域少数民族，元代称为色目人。他的祖父萨拉布哈、父亲傲拉齐，都在元朝为武将，长期镇守雁北、代州地区，居住雁门。萨都剌就以此为家乡，诗集称《雁门集》。萨都剌生活在元朝太平时期，他个人又常在江南做官，诗中少杀伐之音，笔下多山水景物。写景诗秀雅优美，流丽清婉，但有一种天然清爽之气，别具一格。

这种别具一格的写景即事诗作，可举描写西湖与上京南北两端之作见其一斑：

桃杏花开红映人，池塘水暖绿粼粼。
典衣沽酒入城去，报道江南二月春。

断桥芳草生合路，隔水杨花飞渡城。
客里不知春早晚，年年杯酒过清明。
（《城南偶兴二首》）

一镜湖光开晓日，万家花气涨晴天。
涌金门外春如海，画舫笙歌步步仙。
（《次王侍御游西湖韵》）

祭天马酒洒平野，沙际风来草亦香。
白马如云向西北，紫驼银瓮赐诸王。

牛羊散漫落日下，野草生香乳酪甜。
卷地朔风沙似雪，家家行帐下毡帘。

紫塞风高弓力强，王孙走马猎沙扬。
呼鹰腰箭归来晚，马上倒悬双白狼。
（《上京即事》五首选三）

写西湖之美丽，不是一味秾丽甜腻，而是能够清爽。“客里不知春早晚，年年杯酒过清明”，甚至略带无奈清狂，暗含酸涩，别有韵味。“一镜湖光开晓日，万家花气涨晴天”，又写得俊朗豪迈，与众不同。

萨都剌的怀古诗词，最为人所称道。他有一些反映蒙古王室上层斗争的诗篇，写北国边塞的诗篇，也为人称道。后者如《寒夜闻角》：“野人一夜梦入塞，走马手提铁节鞭。髑髅饮酒雪一丈，壮士起舞毡帐前。”再如《李过陵墓》、《过居庸关》等等，也能显示作者北国诗人本色。但是能把常见题材写得与众不同，别具一副手笔，却更应给予重视。在一定意义上说，这改变了文学发展的轨迹。历史上有几十个北方民族融化在山西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寻找其轨迹，罗列其人物和事件。这些民族在生活习俗、文化风尚、审美心理、文艺形式诸多方面，影响了山西文化和文学风貌，决定了山西文学重要特色。这是绝不能忽视的。

民族融合是双向的，汉族与少数民族互相产生重大影响。生产、生活、习俗、礼仪的互相了解、接近、吸收、融合，有助于文学融合。春秋时晋人与戎狄互相婚嫁。战国时赵人主动学习胡俗。鲜卑族初入山西，代郡人卫操率宗族乡党主动归附，成为首要谋士。战乱时期汉人北奔塞外，人数众多。“隋末丧乱，中国人归之者无数，（突厥）遂大强盛，势陵中原。”（《隋书·北狄突厥传》）到唐朝安定富庶时，北奔的汉民又回归。贞观三年（629）“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，开四夷为州县者，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。”（《旧唐书·太宗纪》）明代，晋北人北奔蒙古地区垦荒，建立村镇，人数众多，以丘富、赵全为首领，得到蒙古政权的允许和保护。明代学者谢肇淛《五杂俎·地部二》对此观察分析相当深刻：

临边汉民，往往逃入虏地。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，而中国赋役之繁，文网之密，不及虏中简便也。虏法虽有君臣上下，然劳逸起居，甘苦与共。每遇徙落移帐，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，皆亲力作。故其人亦自

合力勇往，敢死不顾。干戈之暇，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，真有上古结绳之意。一入中国，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！

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相通，地域相接的民族容易沟通交融。进入清代，山西人走西口谋生，蒙汉杂处，蒙汉调回响塞北晋北，久为人知。民族融合不是单向的，而是互相渗透影响。

山西历史上先后融入几十个民族，民族融合的双向交流，在山西表现得较突出。山西文人在文学理论思考和文学创作上，常积极推进民族融合。西晋灭亡后，北方大乱。北魏统一北方后，致力推行文教，雅重文学。《魏书·文苑传》说：“永嘉之后，天下分崩，夷狄交驰，文章殄灭。昭成太祖之世，南收燕赵，网罗俊义。逮高祖驭天，钟情文学，盖以颉颃汉彻，掩踔曹丕。气韵高艳，才藻独构，衣冠仰止，咸慕新风。”很多汉族文人参与了北魏振兴文学的努力。其中闻喜裴氏家族，因为有文化传统而且人数多，产生了较大影响。裴敬宪、裴伯茂、裴让之、裴讷之诸人，都有可观的文学成就。如裴让之《从北征诗》值得注意：

沙漠胡尘起，关山烽燧惊。
皇威争武略，上将总神兵。
高台朔风驶，绝野寒云生。
匈奴定远近，壮士欲横行。

裴让之好学多才，少年成名，被誉为“风流警拔”。全诗很有气势，视鲜卑政权为正统，视鲜卑讨伐蠕蠕的战争为正义，是其明显特征。这种心理的基础是：鲜卑这种自称黄帝后裔的北方民族，如果入据中原，实行王道，那就是正统政权。是否实行王道，宽厚待人，也被看做民族关系中衡量善恶去取的标准。唐朝诗人吕温《蕃中答退浑词二首》反映了这类标准。吕温是中唐河中（今山西永济）人，素怀大志，锐意革新，与王叔文志同道合，与柳宗元是同乡兼同志。“永贞革新”时，吕温因出使吐蕃未能参与。出使归来，仍遭贬谪。而这两首诗就是出使期间所作：

退浑儿，退浑儿，朔风长在气何衰。
万群铁马从奴虏，强弱由人莫叹时。

退浑儿，退浑儿，冰消青海草如丝。
明堂天子朝万国，神岛龙驹将与谁！

退浑即吐谷浑，本是鲜卑族中一支，魏晋之后，从东方长途跋涉辗转迁至青海湟水流域，再迁青海湖一带。唐高宗时，吐谷浑受吐蕃侵扰，部落残破，或远走宁夏，或受吐蕃挟制役使欺压，处境凄惨。吕温出使期间，见到被挟制役使的吐谷浑部众的惨状，做诗鼓励吐谷浑自立自强，摆脱奴役，投奔唐朝。当时唐朝招纳安抚弱小民族，安置于边疆地区，以礼相待。从民族关系讲，吕温的态度是合理的。诗写得一唱三叹，韵味深长。隋末唐初，吐谷浑的力量曾经极强；如今仍有万群铁马，实力不弱，但自己消沉，由人宰割。吕温此诗序言说：“退浑种落尽在，而为吐蕃所鞭挞。有译者诉情于予，故以此答之。”这答词第一首批评意味明显，并指出受欺压的原因。第二首指明出路，加以鼓励。文字不多而举重若轻，情意深挚，形象鲜明，确是佳作。从题材内容说，更为罕见珍贵。

隋末王通，在山西在全国都是一流学者。王通汾阴讲学，前后弟子千人，俊杰之士不少，颇有贤人七十的气势。据说唐初名相魏徵、房玄龄、杜如晦都是其弟子。虽不可确考，当时成为天下思想与学术渊薮，大致不差。王通被称王孔子，他也以续“六经”为自己的著述事业，奇怪的是，续六经未能流传下来，所幸弟子们汇集师生对答言语，仿《论语》编成《中说》一书，聊可了解其思想。

围绕民族融合，在理论思考和文学创作上都特别重要的人物是元初文人郝经。郝经是泽州（今山西晋城）陵川人，因才学出众，受忽必烈召请。郝经当即前往。他自己后来回忆：“乃慨然启行。以为兵乱四十年，而孰能用士乎？今日能用士，而能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主也。”（《与宋国两淮制置使李庭芝书》）

郝经出使南宋，被宰相贾似道私自囚禁。囚禁中，他还写了《上宋国主陈请归国万言书》，宣扬天下一气，南北一理，“大一统以安天下”。他说：“一元之气散，而兆人被其害。相与争夺并灭，而公天下之义废。”劝说南宋和谈。郝经这一类文章写得深沉激昂，情理并茂。他喜用短句，读来很有气势。《元史·郝经传》说：“其文丰蔚豪宕，善议论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陵川集》说：“其文雅健雄深，无宋末肤廓之习。”其艺术水准与充实内容相得益彰。

正是民族融合的大视野，使郝经诗歌在题材上深度上都对中国诗史做出

了新贡献。

戏曲艺术的摇篮

中国戏曲最终能够发展，能够成熟，是由于两大类因素的作用：一类因素是中原文化汉文化内，原有的戏曲因素缓慢发展；另一类因素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影响，催化促进。两大类因素也呈现交织融合、共同推进状态。

山西文学史文化史上，不论是中原文化内戏曲因素的逐渐发展，还是接受少数民族文化，推动戏曲发展，都有非常典型的体现，因而得以成为中国戏曲的摇篮。这是山西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。

山西是黄河文明发祥地之一。戏曲因素的发展也有很久历史。在一些新石器遗址的考古中发现了一批古乐器。如襄汾陶寺、万荣荆村、夏县东下冯等地发现石磬、陶埙、陶铃、木鼓等。其中陶埙形状不一，音孔多少不等，反映此地音乐水平不低。传说中夔始作乐，舜帝《南风歌》，击壤老人之歌，都在此地。春秋时晋国师旷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乐师。《国语·晋语》、《吕氏春秋·长见》、《韩非子·十过》中都有他的故事。他技艺惊人，思想比较正统，是个很有思想的音乐家。赵烈侯有擅长歌唱的乐人。韩国有著名女歌手韩娥，其歌声能够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。

王国维认为，俳优之可信者在春秋之世，并举出二人，即晋之优施，楚之优孟。优施能歌善舞，机警过人，在晋献公时候的晋国宫廷斗争中，成为重要人物。巫觋遗风，在于傩祭傩戏。国傩之外，乡人傩流传各地，盛衰不一。山西的迎神、赛社、驱灾、斩旱魃小戏祭礼，种类繁多，都属傩祭傩戏性质。至今流传有相关文献，如明代《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》、清代《康乐星图》、《扇鼓神谱》等，非常珍贵。

晋自古多出法家。而儒家一些思想观念，包括对俳优百戏音乐的限制，在晋推行起来，却可能受其影响，不能深入。这为少数民族进一步冲击儒家文化观念文艺风气，准备了条件。西晋灭亡后，雅乐系统在北朝几乎消亡。《魏书》云：“诸帝意在经营，不以声律为务。古乐音制，罕复传习，旧工更尽，声曲多亡……然方乐之制，及四夷歌舞稍增，列于太乐，金石羽旄之饰，为壮丽于往时矣。”雅乐实际消亡，夷乐列入太乐，一消一长，曲调和乐器的变化，推进了戏曲音乐的发展。夷乐当指龟兹、康国、天竺、高丽诸乐。而西凉乐可能被看做国乐了。《隋书》载，魏平西凉得之，“谓之西凉

乐,至魏周之际,遂谓之国伎”。

北齐诸帝可能是历史上最爱音乐的君主了：“杂乐有西凉、鼙舞、清乐、龟兹等，然吹笛、弹琵琶、五弦及歌舞之伎，自文襄以来，皆所爱好，至河清以后，传习尤盛。后主惟赏胡戎乐，耽爱无已，于是繁手淫声，争新哀怨。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，至有封王开府者，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。后主亦自能度曲。亲执乐器，悦玩无倦，倚弦而歌。别采新声为《无愁曲》，音韵窈窕，极于哀思，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声唱和之，曲终乐阕，莫不陨涕。虽行幸道路，或时马上奏之。”（《隋书·音乐志》）作曲齐后主，填词李后主，可以前后相映。齐后主所好，多悲哀之曲，其开国先辈则不同。著名的《兰陵王入阵曲》即为高欢之弟高长恭而作，歌舞戏雏形“代面”因此而成。王国维评论道：

> 古之俳优，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。自汉以后，则间演故事；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，实始于北齐。顾其事至简，与其谓之戏，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。然后世戏剧之源，实自此始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云：“代面出于北齐。北齐兰陵王长恭，才武而面美，常著假面以对敌。尝击周师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。齐人壮之，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，谓之《兰陵王入阵曲》。”（《宋元戏曲史》）

《乐府杂录》鼓架部云：“乐有笛、拍板、答鼓、两杖鼓。戏有代面，始自北齐神武弟……戏者衣紫，腰金，执鞭也。”服饰威武，假面狰狞，动作勇猛舒展，战胜后再现美男子本色，表胜利喜悦及风趣。音乐不能一味雄浑豪壮，而当摇曳多姿。

《踏谣娘》歌舞戏更具民间气、生活气，表演及音乐须有悲有喜，谐谑风趣，独唱伴唱交织，开歌舞戏曲新生面。唐崔令钦《教坊记》载：

> 《踏谣娘》北齐有人姓苏，鼾鼻。实不仕，而自号为郎中。嗜饮酗酒，每醉，辄殴其妻。妻衔悲，诉于邻里。时人弄之：丈夫著妇人衣，徐步入场，行歌。每一叠，旁人齐声和之云：“踏谣和来，踏谣娘苦，和来。”以其且步且歌，故谓之踏谣；以其称冤，故言苦。及其夫至，则作殴斗之状，以为笑乐。

据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，此戏流传山西、河北，以弦管类乐器配乐，不

同于《兰陵王入阵曲》多鼓板。王国维指出此两戏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，并分析其原因说：“此二者皆有歌有舞，以演一事；而前此虽有歌舞，未用之以演故事，虽演故事，未尝合以歌舞；不可谓俳优戏之创例也。盖魏、齐、周三朝，皆以外族入主中国，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，龟兹、天竺、康国、安国等乐，皆于此时入中国。”这奠定了此后戏曲发展以歌舞音乐为基础的体制。

中国戏剧未向话剧方向发展，但不乏以语言和演员表情见长的艺术形式。上党羯人石勒所建后赵有‘参军戏’,为这种形式之滥觞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赵书》云：

>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，断官绢数万匹，下狱，以八议宥之。后每大会，使俳优著介帻，黄绢单衣。优问：“汝何官，在我辈中？”曰：“我本为馆陶令。”斗数单衣曰：“正坐取是，入汝辈中。”以为笑。

让贪官现身说法，俳优调侃戏弄之，既有观赏趣味，又有惩戒意义，遂经常搬演。北齐俳优石动桶也精于此伎，调孔子、调士人、调佛，机智幽默，妙语连珠，深受高欢喜爱。入唐，参军戏形成体制，风格为幽默调侃，演员分参军、苍鹘。从形式和风格分析，唐代滑稽戏包括“戏孔”、“弄孔子”，到宋代杂剧，直到后代相声，当与参军戏有渊源。而戏曲的宾白和科范，可能受到参军戏的影响。

在五代时期，山西地区的戏曲又有一次快速发展和普及。直接推动者是后唐庄宗李存勖。据《新五代史·唐本纪》：“庄宗既好俳优，又知音能度曲，至今汾晋之俗，往往能歌其声，谓之御制者皆是也。其小字亚子，当时人或谓之亚次。又别为优名以自目，曰‘李天下’。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，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。伶人由此用事。”

据此分析，李存勖们平素演练的是歌舞戏，因此他才亲自度曲。这些歌舞戏演出，有时可能允许军民观看，因此御制曲才能流传汾晋，历久不衰。当时优伶技艺高，角色分类固定，优伶才能获得艺名，李存勖也给自己起了艺名。此外，据著名优伶敬新磨善俳谐、机智风趣语言被记载的情况看，敬新磨所长是谐谑滑稽戏即参军戏一脉。李存勖本人曾经装扮卖药郎中，让儿子装扮衣服破旧的随从，仿佛参军、苍鹘变相，去调侃皇后。李存勖死时，敬新磨搬来乐器火葬他。这些都给人一种感觉，当时歌舞戏和参军戏（滑稽戏）正在合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